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

〔英〕伯托莫尔(Thomas Bottomore) 费涓洪译 谈谷铮校

〔内容提要〕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社会学已经结合起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目标是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成分(这是使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一点),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是工业技术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努力理解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一门开始是积极活跃的学说,眼前已在悲观主义的沉思默想中宣告结束。

在战后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哲学”或“实践哲学”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科尔什(Korsch)、卢卡奇(Lukács),葛兰西(Gramsci)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哲学家们,特别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马库塞(Marcuse),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除了学术上的影响以外,他们也深受政治事件的影响。俄国的革命表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小小的革命党完全能够有效地干预和改变政治事件的进程,而西欧的工人阶级,则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还是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都未能打开革命局面。这一事实提供了正反面的教训:必须从外部引进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义解释的革命精神,来灌输给本国的工人阶级。纳粹党人和法西斯运动的嚣张,以及工人阶级的无能为力的抵抗,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会在工人阶级内部自发发展,最后还可能在一部分中产阶级中自发发展(如伯恩斯坦主张的)、或者认为必然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同时,纳粹党和法西斯运动的得逞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估价方面产生了另外一些分歧。

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这方面的许多影响。他的主张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所收集的论文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它主要是建立在两个

思想基础上,第一,历史的真相是通过历史进程进行理性洞察才发现的,而并非通过经验的和社会学的调查。卢卡奇对布哈林(Бухарин)的著作的批判性评论充分说明了社会学和以辩证法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评论中,他把布哈林的“错误的方法论”及其马克思主义观念称为“普通社会学”。他说:按照布哈林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必然结果,社会学不可能局限于只是一种纯粹的方法,它必须发展成为一门有自己目标的独立的科学。第二,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只有它才能具有对历史进程的充分、真实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理性的和系统的阐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实际意识具有各种形态,革命意识并不占有主要地位,而且除了少数情况外,工人的实际意识并不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因此卢卡奇必须将实际的“心理”意识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外界灌输”的理性意识区分开来。而这个“外界灌输”过程就是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工作。

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卢卡奇相像。这些看法也是在一篇批判布哈林的著作的文章中阐述的。文章认为:把社会学说成是实践哲学,这意味着什么?这种社会学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门政治学和历史编纂学

吗？或者是按照特定序列分类的、用政治学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标准的技术进行纯粹经验观察而得来的那种系统性的材料汇合吗？试图创造一种所谓社会事实的精确的（即实证主义的）科学，那不是社会学，而是政治学和历史学——即萌芽状态的哲学，不是吗？社会学有没有试图去做与实践哲学类似的事情呢？……社会学试图创造一种历史和政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形式是由预先详尽阐述的哲学体系所决定的，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社会学反对的进化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这是企图用如“预言”橡树会长出橡果这样的方法，“通过实验”取得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庸俗进化论正是社会学的起源。社会学不可能通过从量到质的过程来了解辩证法的原理。但是这个过程打乱了所有进化方式和所有庸俗进化论意义理解的同一性的规律。葛兰西认为，社会学没有制订出任何真正的“规律”（这是任何针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评论中常见的陈词滥调）。

葛兰西的主要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哲学的世界观。

虽然葛兰西企图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明确区别开来，但是他没有否认社会学作为“一种实际观察的经验汇编”的全部价值。科尔什在他的著作的开头，用与卢卡奇非常相似的风格，把马克思主义也说成是一种哲学形式。他说，正如德国唯物主义哲学曾经成为革命资产阶级理论的表述一样，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学成分在他的著作中逐渐取得显著的地位。科尔什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学说之间的关系。他把起源于孔德、并由穆勒（Mill）和斯宾塞（Spencer）传播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社会学描述为“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反动”之后，几乎没有提到过任何现代社会学研究。他只是把“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归纳为四个基本原则：（1）历史陈述的原则——“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时期认识各种社会事实”；（2）具体应用的原则——这似乎是指对资产阶级家庭、财产关系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经验主义基础；（3）革命变迁的原则——与进化

论相对立；（4）革命实践的原则——试图通过分析和批判来发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使人们能够有意识地、理性地参与历史进程。

科尔什在他的主要著作《卡尔·马克思》中，详尽阐述了这些原则。该书最重要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是科尔什强调分析一切社会现象时不能离开它们同经济的关系，并强调经济是一种历史现象的观念，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在为以后出版的本书修订本而准备的一段文字中，科尔什认为，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事实：社会学把社会关系的体系看作是探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首先分析经济这一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关系体系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的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在以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进行的批判中一直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之点。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科尔什用非常抽象的方法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而极少注意诸如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以及关于在经济结构中或阶级体系中的变迁等这些实际问题。这表明，科尔什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十九世纪中期的、主要是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形成对比的学说。

以后，科尔什全盘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似乎又回复到了一种哲学的社会观上去了，但这种社会观更具有个人的主观的性质。科尔什思想后期的发展，与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一些思想家是极其相似的。事实上，科尔什参加了1922年举办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著作周”，法兰克福研究所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第一次会议上的许多讨论内容收集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中。这本书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哲学形式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法兰克福研究所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和马库塞（Marcuse）回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青年黑格尔派所关心的问题上。首先，他们强调主观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文化上层建筑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重要性，并把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阐述马克思所嘲笑的那种“批判的批判论”

方面。当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形势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许多其他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它们吸收了黑格尔的哲学，参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经济和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法西斯主义的出笼，这些变化提出了许多值得批判地研究的新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把法兰克福哲学家与青年黑格尔派联系起来共同特征，即都不承认工人阶级。在这方面，马克思超过了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正是通过发现无产阶级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物质力量（在这种社会生活中，革命实践和理论批判已经、并且将会统一起来），从而提出了一种实践哲学、一种实践-批判活动的观念。而法兰克福思想家则认为，在他们面临的形势中，工人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因此他们倒退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见解——革命活动是革命的“批判意识”的产物。

法兰克福哲学家对于社会学的批评主要是间接地，通过对实证主义的批评进行的，虽然马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中曾经明确地否定了孔德的社会学。

但是，对实证主义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的批评并没有成为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全部工作，它花了许多精力去探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具有显著重要性的新课题，特别是试图将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以及试图运用这些学科分析法西斯主义这一新的动乱现象。

这些课题的研究受到了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的极大鼓励，他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与法兰克福研究所发生了联系，直到1939年主要由于该所激进主义方向的日益衰落才脱离了关系。弗罗姆在该所杂志《社会研究杂志》（1932）的第一期中，发表了题为“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的论文，他认为心理分析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性的概念，能够更加恰当地说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后来发表的关于现代社会中个性的发展，独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心理学的论文附录中，他陈述了对于“社会性格”的看法，并总结了她的观点。

弗罗姆的著作比法兰克福研究所的许多其他

成员更富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当他在承认社会中的经济、心理和思想意识的力量虽然是相互依赖的，但也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时候，他曾指出，“经济发展尤其是如此，它既依赖各种客观因素，如自然生产力、技术、地理条件等，同时，它又按照自己的规律而行事”。但是，总的来说，法兰克福研究所越来越对哲学方面的问题发生兴趣，尤其是1949年重新回到德国以后。“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现在集中注意力于大众文化的批判，他们把这种文化看作是启蒙运动唯理主义的反面。他们还集中注意力对科学技术思想中的智力优势进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思想与对实证主义的全面批判结合起来了。这种批判重演了十九世纪后期方法论的争论，同时引入了一些新的论题，尤其是语言哲学方面的论题；于是他们的思想逐渐失去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的任何特点。在马库塞和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六十年代末实际瓦解前的若干最后一代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Habermas）和韦尔默（Wellmer）的著作中，这种思想活动最为明显。

马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在先进的工业国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已建立起一种支配形式和一种社会控制体系。由于通过使工人阶级同社会达到社会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这种支配形式和社会控制体系已经消除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力量，即那种能够带来新型社会的根本的历史性变革的力量。

马库塞得出结论说：“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不具有能够跨越现在和将来鸿沟的思想；它既没有给人以希望，又没有显示什么成功，它始终是消极的。”这暴露了一个特殊的“批判理论家”对历史顽固地信奉着一种主观、武断的解释，这种解释既不再与社会运动有关，也不与可以普遍理解的知识结构以及用来判断其观点正确与否的标准有所联系。这也是对任何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后背离，因为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两个必不可少的成分：一是经济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的、有“进步”意义的概念；二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唯一的历史代表和文明使者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同样，哈贝马斯和韦尔默也用类似的方法脱离了马克思主

义。他们断言，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大为削弱，甚或变得微不足道；他们强调，正是文化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才是必须完成根本变革的领域。而可能是使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理论中的实证主义成分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与社会学相对立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两个总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法兰克福学派后期著作中表现得最明显——是回复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体制中去，这是指它更接近于黑格尔而不是接近马克思而言。正如利希泰（Lichtheim）所评论的：“假如我们发现当代思想再现了早期的历史形势（即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形势）的问题，那么我们有权认为，这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又变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黑格尔追随者所遇到的那类问题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对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政治条件下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的变幻不定而作出的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垮台（可解释为这是它们的“改良主义”的结果，反过来这也是科学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相反，通过革命先锋队的行动，俄国革命取得成功；西欧工人阶级革命献身精神的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活跃的右翼运动的抬头……当事情的趋势确实看来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时候，当着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历史是在我们这一边的”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但是当历史的进程出现了比较令人不满的方面时，例如在极权主义政权时，或者1945年以后一种看来是比较稳定的不平等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建立时，那些想保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希望的思想家就被推到对马克思主义作不同的解释方面去了；即强调在实际活动中的

主观成分——革命觉悟和献身精神。当然，这种解释仍然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二十年代早期的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什把这种革命觉悟看作是共产党人的具体表现，而法兰克福哲学家们则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有品质。但是，他们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即对历史真相应当具有特殊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能会与那种用一切令人烦恼、作呕的方式、对历史事件作任何单纯经验的、社会学的叙述反其道而行之。

在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第二个非常古怪的特征是：当哲学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社会学的时候，它越来越背离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的、最有影响的思想，同时与一些可以在最近的社会学中发现的概念和方法越来越接近。广义地说，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社会学已经结合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特色的东西也失去了。在思想方面，批判的主要目标是现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成分，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实际生活方面，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工业技术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当然，正如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一样，这些批判对象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实证主义被看作工业技术社会所产生的支配形式，反过来它又发挥了支持和加强那个社会制度的思想的功能。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政治上的激进理论或革命理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马克思主义者与学生运动的激进主义发生了主要是偶然的，无论怎么说，也是短暂的接触；但是他们主要是努力理解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一门开始时是积极活跃的学说眼下已在悲观主义的沉思默想中宣告结束了。

（摘译自英国伯托莫尔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书）

